

魯迅幾樁疑案的剖析

周冠華

魯迅的孫子周令飛與他熱戀中的女友張純華

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同機從日本僞裝飛香港，在過境桃園機場時，公開聲明脫離中共，投入中華民國的懷抱，達成不受政治干涉自由戀愛結婚與棄暗投明的雙重意願，因而掀起一陣新聞熱潮。周令飛投奔自由，連帶使他的祖父魯迅也成為報章雜誌的熱門話題。

我與魯迅因有同宗與同鄉之雅，早年即特別注意他的作品。魯先生前我曾讀過他不少的文章；他死後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刊行的魯迅全集二十冊（包括翻譯作品在內）我曾經全部讀過。我又與認識魯迅的朋友們討論魯迅其人、其事、其文。大家都認為魯迅是有才華的，一致惋惜他被共產黨牽着鼻子走，受盡鞭策，無可奈何的嘆息着「俯首甘爲孺子牛」。他在臨死前遺言指示他的兒子海嬰：「不要做空頭文學家！」這正是他悔恨自己才華沒有正常發揮的心聲。

幾個月來，報章雜誌上刊登關於魯迅其人其文的篇章着實不少，有正確的，也有失實的。現在儘可能將報章雜誌未曾涉及的關於魯迅的種種寫在下面，自信這些都是從來未曾公開發表過的

關於魯迅的事情，尚請中外雜誌廣大讀者指教。

原因。」

兄弟反目原因何在

七十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國時報周令飛「三十一年來話從頭」之二十四「我祖、我父、我」一文中說：「祖父共有三個兄弟（冠華按：其實魯迅還有一個四弟，名椿壽——魯迅本名樟壽，字豫山，後改豫才，又改樹人。因母親姓魯，故筆名）魯迅，椿壽生於一八九三年，一八九八年因患急性肺炎病歿，年僅六歲。」他排行最長，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三兄弟各有各的名氣。周

作人我應該叫他二爺的，只是我們家與他們家從來沒有來往過。祖母說：周作人曾經當過漢奸，替日本軍閥做事，對太祖母甚爲忤逆，被我祖父痛責後，兩兄弟從此斷絕關係，不相聞問。因此，即使兩家同住北京，我們從來沒有與周作人家走動過，甚至周作人去世，他兒子寄張訃聞來，我父親考慮再三，都未參加。爲這事，我曾勸過父親，我認爲不管怎麼說，他總是周家人，生

民國四十三年春間，有一天我看曾今可先生，閒談中，曾先生說明他早年的一闕詞，其中生，有「國家事，管他娘，搓搓麻將」的句子，竟在反諷。魯迅故意誤解而罵他。後來我們談到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反目的事，他說當年他曾聽到一位與魯迅兄弟關係十分密切的友人相告，乃因魯迅對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某種行爲導致兄弟反目。

曾今可不是隨便妄語的人，這「傳聞」一定不是他憑空捏造的。

關於這一傳聞的真實性，我為求證，曾查考有關資料，茲根據魯迅日記等原始資料，撮敍他們兄弟失和前後情形。

全家同居一宅情形

魯迅於民國元年一月間應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部員。五月，政府移北平，魯迅與許壽裳一同乘海輪北行，住北平宣武門外紹興會館之藤花館。後來周作人也到了北平，任職北京大學。據周作人追憶：會館坐西朝東，進了頭門二門之後，照例是一個大院子，正屋是歷代鄉賢的祠堂；從右側弄堂往西去，後邊一進平房是魯迅寄住過的地方。小小一個院落，南首有圓洞門，通到東邊，門內一棵槐樹，北首兩間下房，正面一排四間，名叫「補樹書屋」。只因極北一間，被下房擋住了陽光，所以關閉不用。魯迅所用的，就是那外邊三間罷了。從民國二年住到民國八年。魯迅睡在靠北的一間房裏，南頭作爲周作人的臥室、客室，中間房內放着一張書桌與方桌，是洗臉吃飯的地方。

民國八年他們兄弟賣掉紹興老屋，買了北平八道灣十一號的住宅，將母親接來北平與他們三對夫婦同住（當時魯迅的太太是原配朱阿安女士，並非許廣平）。這時候作人、建人都已有子女，魯迅夫婦尙無子女，他們三家及太夫人都在一起吃飯。

民國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魯迅與周作人開始反目。八月二日魯迅移出八道灣十一號住宅，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他們兄弟反目成仇的原因，魯迅與周作人一直沒有明白說出，不知是否因家醜不可外揚，或另有其他難言之隱。

現在讓我們看看魯迅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看，此可記也。」

由此可知他們三兄弟與眷屬和太夫人自遷住北平八道灣十一號住宅後，一直都是在一起吃飯的。直至魯迅與周作人反目的當天晚上，魯迅纔單獨開伙。

魯迅與周作人反目時，周建人已去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建人的太太則仍住在北平八道灣大宅。

自七月十四日親兄弟反目成仇後，魯迅便準備移出八道灣大宅。至七月二十六日，他已覓妥房屋。他的二十六日日記云：「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入箱」。二十九日記有「終日收書入箱」。八月一日記：「午後收拾行李」。八月二日云：「下午携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魯迅搬離八道灣大宅後，他們的母親仍與周作人同住。

磚塔胡同只是賃居，後來魯迅於十月間另外買下阜內西三條胡同的一幢房子，次年五月才遷入。

搬家後，魯迅回老家去取書，又與周作人夫

婦發生衝突。魯迅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六月十一日記云：「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雜器，比進西廂，啓孟（周作人字啓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係一日人）及張鳳舉、徐濯辰（二人均留日，當時任教北大均爲周作人的同事）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完之處，則啓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此後魯迅日記中，便永遠不提「啓孟」或「二弟」了。

另據魯迅的密友許壽裳的回憶說：「作人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他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繼又搬往磚塔胡同了」。

綜觀以上周作人的回憶，魯迅的日記與許壽裳的回憶，可知魯迅與周作人遷北平多年來都是十分友愛。兄弟反目是突然發生事件。再印證曾今可所聽到當時的傳言，他們兄弟的反目成仇乃是因魯迅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某種行爲而引起，則大有可能；另據魯迅日記，其母於他搬住後十天纔去看他，顯然也是對他的行爲的不滿。由此可以推知這是一件甚麼事情，所以魯迅來死都不要再提到他的二弟。甚至遺命他的子孫與周作人家永不往來，可能是擔心子孫與周作人往來，會聽到這件事的隱情，因此竭力防止。至於許廣平告訴周令飛的兩個原因，顯然都非事實。因為周作人當漢奸是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以後的事，距離他們兄弟反目不相往來已遠在十四年以後。而魯迅搬出八道灣大宅後，他們的母親仍與

中周作人同住，由作人奉養，以終天年，所以說周作人忤逆母親與事實不符。

「孺子牛」詩兩種解釋

魯迅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在郁達夫請吃飯的席上，寫了一首「自嘲」的七律送給柳亞子（柳亞子早年爲南社詩人，後來墮落爲毛澤東的捉刀人，毛的好些詩詞都是他代筆或經他修改的）。

現在將「自嘲」原作錄下：

運交華蓋復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這首詩的第三句「舊帽」與第四句「破船」

「後來改爲「破帽」與「漏船」，第五句「

冷對」改爲「冷看」）

此詩原稿後面有「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等語，從知魯迅尚有自知之明，他的詩僅爲「打油」之作，並不高明。但後來這首却特別出名，尤其頸聯（五、六兩句）成爲傳誦人口的名句，這是另有其他因素造成的，與詩的優劣無關；現暫時撇開此詩的優劣不談，且來探討此詩第六句「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真正含義。在原稿上的「偷得半聯」，即指此句。清代洪亮吉在所著「北江詩話」卷一中曾載：「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即引與嬉戲，惟恐不當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

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真狂士也」。

魯迅將原句「飯飽」改爲「俯首」，襲用其餘五字，因此過去有人指責魯迅偷句，魯迅在原來寫給柳亞子的詩箋上已聲明「偷得半聯」即指此。照通常的解釋「孺子牛」的「孺子」應是指當時魯迅的四歲兒子海嬰，「孺子牛」的典故出在左傳哀公六年：齊景公嘗衡繩爲牛，使他的名字叫做荼。他的兒子牽着他走，因茶跌倒而折斷了景公的牙齒。

（「北江詩話」中的「孺子牛」亦用此一典故。）

魯迅在復李秉中的兩封信中說：「孩子生於前年九月間，今已一歲半，男也。以之生於上海之嬰孩，故名之曰海嬰。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無求

於後嗣，雖無子女，素不介懷，後顧無憂，反以

爲快。今則多此一累，與幾隻書箱，同覺笨重，

每當遷徙之際，大加勞頓之勞。但既已生之，必

須育之，尙何言哉。」「我本以絕後顧之憂爲目

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嬰兒，念其將來，亦常惆

悵。然而事已如此，亦無奈何，長吉詩云：『已

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只得加倍伏勞，爲孺

子牛耳，尙何言哉。」照魯迅自己的說法，這「

孺子牛」也是用的左傳齊景公的典故。但魯迅的

詩都有言外之意，意外之意。因此我們必須仔細

探究「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真意。我經考查魯迅寫此詩時，正值當年共產黨潛伏上海租界的地下

「統戰」小組負責人瞿秋白命令「創造社」的郭沫若，「南國社」的田漢等人向魯迅圍剿，魯迅

起而應戰，後來瞿秋白去江西瑞金，周揚（當時叫周起應）從日本回來接替「統戰」小組的工作

，而魯迅早已通過日共的關係與史太林主持的「

第三國際」有接觸，並接受「第三國際」的津貼，而爲其工作。因此史太林密令中共拉攏魯迅，也要魯迅與中共合作。於是中共停止對他的攻擊，並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擁護他爲左翼作家聯盟

的領導人；事實上魯迅必須聽命於周揚，雖然魯迅不服氣，當時却無可奈何。自從史太林密令中共拉攏魯迅，魯迅接受中共領導後，他有了受鞭

策與毫無自由的感受。他在寫給胡風的信中說：

「我總感覺得我鎖在一條鏈子上，鎖在一條鐵鍊

上，背後有一個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得越利害」，另一信說：「我正像一條拉車的牛，在我的前面掛着一束吃不到的青草；後面的主子手中隨時會向我抽打下來的皮鞭。」而上面那首「自嘲」七律正在這種背景下寫成，我認爲在魯迅寫此詩時的潛意識中，「牛」當然是說他自己，「孺子」則明指海嬰，隱指周揚。（「

孺子」一詞有時候含有卑視的意義。如「時無英雄，竟使孺子成名」一語中的「孺子」便有此意

甘受第三國際利用

民國十七年五月魯迅翻譯「蘇聯的文藝政策」刊在他主編的「奔流」月刊上。「蘇聯的文藝政策」是史太林加在蘇俄文人頸項上的一條鎖鍊，魯迅奉命翻譯，是共產黨要將這條鎖鍊也加在中國文人的脖子上，不知魯迅是否願意，但他却不得不做。十九年七月翻譯蘇俄文學家小說集一本

，以後還代表「第三國際」發表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些都是他爲他的蘇維埃祖國效力，爲「第三國際」賣命來迷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爲赤化中國鋪路的工作。

梁實秋「關於魯迅」一文中曾說：「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官兵與蘇俄帝國主義者發生軍事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桿上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好奇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顯明的了。」

因種種跡象顯示，使大家逐漸明白魯迅與第三國際的關係。當年更有人獲悉魯迅接受蘇俄盧布津貼的事實，曾在報上予以公開揭露。於是魯迅在民國十九年對某大學學生講演講題爲「象牙塔與蝸牛廬」的講詞中竭力否認並反擊說：「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莫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譖，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這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了。」可是事實畢

竟是事實，魯迅的否認與反擊反而欲蓋彌彰。

兩度婚姻及其個性

魯迅的偏激，是大家所公認的，許多佩服他的人，甚至於他的最親密的朋友，也都是如此認定。他一生的言行，幾乎都可以印證。說到魯迅無情，我們可以從他對原配妻子、對兄弟、對朋友三方面來考察。魯迅的正式夫人朱阿安女士，是他奉母命正式結婚的原配夫人。魯迅對她是完全無情義的，他曾公開對許壽裳表示：「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照理說魯迅既然反對這件婚事，當初便不應該同朱女士結婚；即退一步說，結婚後也應該離婚，使朱女士可以另外嫁人。但魯迅却不如此做，他與許廣平結婚後，朱阿安仍然是他名義上的正式夫人，朱女士的一生幸福便這樣給葬送了。魯迅對原配夫人的冷酷無情，如胡適比較，正好極端相反。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顯然是他的錯。以後他更寡情絕義到底，甚至遺命子孫都斷絕往來。至於魯迅對朋友的無情，可以他與林語堂爲例，民國十五年任廈門大學文學系主任的林語堂邀魯迅往廈大執教，但後來魯迅無緣無故罵起林語堂，真是反臉無情。一個對妻子、兄弟與愛護他的朋友都寡情絕義的人，可是共產黨的傳聲筒却說他如何熱愛人類，豈非睜眼說瞎話。至於魯迅的多疑，也有實例：他在北平時，某一天，一位青年學生跑到他家裏去，對他出言不遜，罵了一頓，悻悻然走了。多疑的魯迅

，故意到他家裏裝瘋賣傻，製造事件，破壞他的名譽，打擊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於是他在「語絲」周刊出了號外，將此事公諸社會，並對楊樹達教授大張撻伐。後來事實證明這事件與楊樹達絲毫無關，那位學生真是一個瘋子。而楊樹達却並不與他計較，對比之下，二人的修養與風度，真有天淵之別。

最後說到魯迅的矛盾，他的言行幾乎處處有矛盾，他的大量的雜文中，隨處可以找到今天一個是非，明天又一是非，前言與後語完全不一致。舉個實例：當魯迅的密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時，魯迅曾給他開了一張書單，其中包括抱朴子、論衡、世說新語等十多種古籍。但當施蟄存給人開書單時，他却在「遺少不安份子」一文中大罵施開倒車，他說：「驅使青年鑽入故紙堆中，以蠶食其生命，有意無意爲反動勢力張目。」

魯迅偏激、無情、多疑、矛盾的性格的形成，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因他祖父周介字於光緒十九年爲他的兒子周伯宜（即魯迅的父親）等向清廷舉行癸巳恩科鄉試的主考官行賄銀票一萬元，事情敗露，周介字父子被捕，關在監獄裏，伯宜不久病死，介字候斬六年，用了大量金錢活動始獲開釋，周家因此由富有的家庭敗落，魯迅小時受人白眼，於是養成他憤世嫉俗的「恨」的人生觀，這一人生觀也成爲魯迅性格的淵源。第二個原因是魯迅受第三國際控制給共產黨牽着鼻子走，許多言行身不由己，久而久之，便鑄成他無情、矛盾的個性。

觀察敏銳先見之明

魯迅的確有敏銳的洞察力，有時候甚至有先見之明。我現在也舉一個例子：魯迅於民國十六年，曾發表過「革命與文學」，其中有一段說：「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見現實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他又要痛苦了。……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界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吃了麻醉藥。蘇聯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與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中國大陸赤化後，當年謳歌共產黨，為共產黨拼命去打天下的三十年代的一批文人，都以為鴻鵠將至，誰知都成了被烹的功狗。如老舍、巴金、田漢、翦伯贊、艾思奇、夏衍、曹禺、冰心、陳白塵、陽翰笙、艾青、臧克家、沈從文、丁玲、胡喬木、劉白羽、張天翼、朱光潛、田間、蹇先艾、宗白華、吳晗、鄧拓、廖沫沙等，或自殺，或被殺，或被鬥爭、毆辱後送到勞改營或監獄去改造。他們過去的作品，都成爲「毒草」；他們過去爲共產黨打天下的功勞，都成爲罪惡。他們都「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

魯迅的確有先見之明，早已爲他們作了準確的預言。所幸魯迅自己死得早，否則他自己也會步上老舍他們的命運。

「秋夜」疊句硬加狂捧

魯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散文「秋夜」，是他在民國十三年的秋天，寫於北平阜內西三條胡同的住宅。這住宅屋後有小園，種着刺梅。在後園還可以看到牆外的樹木。他在「秋夜」中所寫的就是這兒的情景。

「秋夜」的開端是這樣一段文字：「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秋夜」這篇散文在三十八年以前曾被選入中學課本，過去在大陸唸過中學的人幾乎普遍讀過。由此可見政府當年不僅沒有禁止魯迅的作品，而且還將它編入學校課本中，顯見我政府教育政策的開放性。）過去左派文人會將這段文字捧爲曠古絕今的神來之筆，說這一疊的神奇絕妙，活潑流麗。並解釋說魯迅寫此文時，第一眼望過去，祇看到兩株樹，再仔細看第一株是棗樹，又看另外一株也是棗樹，這種疊句可以加深讀者的印象，比「六鶴退飛」之句高明得多。（按公羊、僖十六年載：『是月，六鶴退飛，過宋都。視之則「六」，察之則「鶴」，徐而察之，則「退飛」。』這是剖析「六鶴退飛」句法先後有序。）這種捧法，祇有共產黨徒及其同路人「肉麻當有趣」纔說得出來。其實魯迅此句，怎可與「六鶴退飛」相提並論。「六鶴退飛」是史臣看見空中水鳥遇風而退的實情，這是偶然，驟然看到的一個動的鏡頭，所以依視覺的先後予以紀錄。而「秋夜」是魯迅寫自己園子及其牆外的情景，我們看「秋夜」的下文有「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

也落盡了」一段，可知他寫此文前早已知道後園牆外有兩株棗樹，而且一天天看它們逐漸落盡葉子，不知看過多少次了。但在執筆爲文時竟如此開端，豈非矯揉造作。試問他的後園牆外如果有十株或百株棗樹，他是否也用十句或百句重複的疊句來寫？魯迅以二十八個字來寫他看到後園牆外的兩株棗樹，而且是沒有其他動作與意義的死句，而「是月，六鶴退飛，過宋都。」僅九個字，包括時、地、物與動作及更深一層的意義，句子簡潔自然，絲毫沒有矯揉造作，豈魯迅所能望其項背。

文字使用疊句，我國遠在周代的詩經中，已有很多疊句，其他如先秦諸子中疊句也不少。此外，古今文人筆下的疊句真不勝枚舉。因詩經與先秦諸子中的疊句多文義艱深，解釋費辭，我現在試舉其他淺顯的疊句，以與魯迅「秋夜」中的疊句比較。

樂府相和歌「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白居易「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易君左遊日月潭，夜憩涵碧樓時寫下一首古風，開端云：「不聞一魚躍，不聞一蛙鳴，不聞一鳥語，不聞一蟬聲，永夜唯月明。」

以上三例中的「江南」與「步東坡」，因爲都是寫人與物的動作的轉換變化，故均覺自然可喜，並無矯揉造作。易君左的「四不聞」雖然分別以魚躍、蛙鳴、鳥語、蟬聲來轉換變化，但已

幻想中的偶像表示失望。

「有雕鏤斧鑿的痕跡，遠不及『江南』與『步東坡』的質樸自然。不過以『四不聞』來烘托永夜寂寂，唯有月明，在境界上來說，仍有可取。

讀者試將我所舉以上三國例證與魯迅「秋夜」中的疊句比較，不難分別其優劣。

文集無雜名不副實

魯迅在文學上有其一定的成就，正像其他有成就的作家一樣，這是不應予以抹殺的。但魯迅的成就十分有限，並無甚麼了不起，距離「偉大」更相去十萬八千里。可是在三十年代作家中，魯

迅享譽之隆與地位的突出以及他的著作譯成多國文字，蜚聲寰宇，都非其他作家所能及，這究是甚麼原因呢？乃是第三國際在史太林的指揮下有計劃的捧他所造成（蘇俄到今天仍在捧魯迅；七

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為魯迅一百零一歲週年紀念日，莫斯科的幾家報章雜誌在九月下旬刊登了一

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祇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除了大量的雜文與翻譯作品外，魯迅的創作

小說僅有「呐喊」與「彷徨」兩小本，其中都是短篇。（最著名也是最長的「阿Q正傳」，也僅二萬多字。）此外「故事新編」是改寫的歷史故

事，也都是短篇。這些小說與故事，衡以現代小

人小說，正好為莫斯科否定中國文化，侵略中國鋪路）中國共產黨從圍攻魯迅，忽然轉變為狂撲魯迅，也是秉承史太林的命令。而三十年代許多左派作家雖然也是中共有計劃捧成，但他們因

未獲得第三國際全面支持，所以聲勢顯然不及魯迅。其實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作品，水準都很低

，遠不如今天臺灣許多作家的作品，臺灣報刊上的許多作品都超過他們遠甚。這不是我一人的偏見，有好幾位過去嚮往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當代

作家，於獲讀他們的作品後，都先後公開對他們

笑「阿Q」，挑起鬭爭情緒正合乎第三國際的胃口，與蘇俄滅亡中國的計劃可以配合；所以後來

「阿Q正傳」的受推崇與風行一時，正是共產黨有計劃的宣傳推動的結果。它的被譯成多國文字

也完全是共產國際的力量促成。我們試看「阿Q正傳」的各種文字的譯本，其翻譯者幾乎完全是

共產黨人與其同路人便可明白。由此可知魯迅得享盛名並不單純因為其著作的成就，主要的原因係由於第三國際與中共的幕後推動。

小說史略尚有價值

關於魯迅著作的評價，除小說部份外。我認為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確是我國最早問世的小說史，是一部開山之作，最有價值。至於他的雜文，因撰寫時別有用心與目的，故內容雜亂，前後矛盾，是非觀點不一致，文學價值極微。他的舊詩與新詩，也不足道。二十年前，我曾與李漁叔談起魯迅的舊詩，李漁叔的評論是「不入流打油」可見他也有自知之明。我們試看魯迅的那首「三字，他又說祇能視為打油詩。我想這批評很中肯；魯迅在寫贈柳亞子的那首詩中便自認爲「

在章法、句法上也不够水準：如八句中有六句的詩，不要說談不上性靈、境界、神韻等等；甚至第五字，分別用「復」「已」「過」「泛」「成

」「與」等虛字，造句單調雷同，不知變化。祇有第六句因爲是「偷句」，第五句必須與第六句成對偶，纔勉强湊成與其他六句句法不同的一聯

。（我二十歲時，便作舊詩詞，也寫白話詩，曾在大陸各報刊發表。來臺後，捨棄白話詩，祇作

舊詩詞，曾在中央、新生、中華等數十種報刊發表。也發表過詩評論文字，當代詩壇勝流，亦多晉接，並曾蒙何武公，成惕軒諸頌彥謬獎，又曾承黃嘉煥教授將拙詩選為政工幹校教材。四十年來，略知舊詩詞甘苦，自信尚能鑑別優劣。」

魯迅的「不入流」的舊詩，過去竟有他的同路人。曹聚仁等捧它為「三百年來無此作」，其實魯迅的詩較諸郁達夫尚差一大截，說他壓倒三百年來的詩人，豈非癡人說夢，使人笑掉大牙！

魯迅的白話詩也像他的雜文一樣犀利；但缺乏詩的味道。因白話詩自萌芽、嘗試迄今，仍然未成氣氛，故不值得細談。

此外，魯迅還用文言與白話混合體寫過詩，他的「野草」中便有一首如下的詩：

我的所愛在豪家，想去尋她今沒有
汽車，搖頭無法淚如麻。愛人贈我玫瑰花，
向她什麼赤練蛇。從此翻臉今不理我，
不知何故今由她去罷！」

這首詩是仿照張衡的「四愁詩」體的，但却有些不倫不類。譚正璧（三十年代的名作家、名教授。著有「中國文學史」等數十種）。在「文章法則」一書中，曾批評魯迅此詩道：「像這樣詩，只能拿牠當做從前的打油詩一般看待，也不是正常的文章所宜取法的。」譚正璧的批評，我亦有同感。

綜觀魯迅的著作，除了「中國小說史略」外，其他的大多數是別有用心與不足道的作品。

雜誌。多晉接，並曾蒙何武公，成惕軒諸頌彥謬獎，又曾承黃嘉煥教授將拙詩選為政工幹校教材。四十年來，略知舊詩詞甘苦，自信尚能鑑別優劣。」

畢業。曾任排、營長、團長、八十八師師長，十四軍副軍長，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參謀長，以少將退役後，任電訊總局顧問。友人林朝果兄任大衆日報社長時，我曾推薦金溟若兄擔任大衆副刊編輯，溟若兄邀葉會西、繆天華兩兄及我輪流為「衆副」寫方塊。會西兄用「禦寇」筆名發表。

後來棄為「禦寇短論集」。會西兄逝世時我曾寫了一首五律悼念他：「夙昔心儀久，相逢離亂中。枕戈懷往績，浮海見孤忠。濟世文章在，傷時感慨同。遺徽空響像，搖落泣秋風。」

會西與魯迅有過一段因緣，現在恐怕已經很少人知道了。原來葉會西於浙江省立第十中學高中畢業後，曾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小小十年」，當時會西年輕，認識未清，傾向共產主義，他曾因事赴廈門，便中謁見魯迅，請魯迅為他的「小小十年」題字，並要求介紹他參加共產黨組織。後來魯迅將「小小十年」介紹由上海的春潮書局印行。扉頁上並印有「葉永華作，魯迅校訂」等字樣。但當時魯迅却勸阻葉會西參加共產黨組織。

會西傾向共產主義的思想從此轉變，隨即考入軍校第五期於武漢入學。以後受三民主義陶冶，

成為堅強的反共鬥士，而且也以文字力闢馬列邪說與揭露中共的罪惡，他的「禦寇短論集」中，即有不少此類文章。

會西生前對他自己早年的這段經過一向諱言，一次他在酒後微醺中告訴我，語焉不詳，並未轉述魯迅勸阻他的那番話。後來魯迅也曾在寫給胡風的信中，阻止蕭軍加入共產黨組織。那信中

隱約表示出這已是多年前的主張，會不會是暗指他勸阻葉會西的這件事？現在讓我錄在下面，以供參看。

魯迅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二日致胡風的信中說：「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裡面去，即鑿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與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信中提到的「三郎」就是蕭軍，所謂「進去」，是參加左聯與中共組織裏去的意思。魯迅的反對態度是很明顯的。

胡適講演評論魯迅

胡適於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四日在中國文藝協會八週年紀念會中演講「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也曾特別提到魯迅的這封信，說明魯迅的内心是

「魯迅先生的毛病喜歡人家捧他，我們這般反共的。胡適的講詞是這樣的：『新青年』沒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熱鬧，慢走上變質的路子。到抗戰時期前幾年，所謂左

中 翼作家同盟組織起來了，那時共產黨儘量歡迎箇
外 批作家進去，但是共產黨又不放心，因為共產黨
雜 不許文藝作家有創作自由。所以那時候監視他們
的人——左翼作家的監視者，就是周起應，現在叫
周揚；他就是在上海監視魯迅這批作家的。諸位如
果有機會，我希望有一本書在自由中國可以得到，
是值得看的。這本書在抗戰初期出版，是魯迅
死後，他的太太把魯迅寫給朋友的信搜集起來，
叫『魯迅書簡集』。這本書裏面幾封信值得看看
，特別是他寫給胡風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
魯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寫的，是一九三五年（他是
誰，大概是蕭軍）應該不應該加入黨（共產黨
）？他說：『這個問題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你
，不要加入！現在在文藝作家當中，凡是在黨外
的，都還有一點自由，都還有點創作出來。一到
了黨裏去就『醬』在種種小問題爭論裏面，永遠
不能創作了，就『醬』死了！』『醬』在裏面去
，這個字用得好極了。底下更值得讀了，他說：
『至於我呢，說來話長，不必說了吧。』他說：
『我總感覺得我鎖在一條鏈子上，鎖在一條鐵錘
上，背後有一個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
力，打的越厲害。』

這一段話裏，打他的就是現在大陸搞文藝的
周揚——那個時候的周起應。這封信不能不看看。
我們要的是沒有人在背後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監
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識，
充分利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來創
作。』

上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上下冊合售 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麟、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 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70元下冊70元
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魯迅被第三國際與中共牽着鼻子走，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從他勸阻葉會西與蕭軍加入共黨組織，可見他天良未泯，從他晚年對共黨的斥責，也顯見他尚不失為血性的漢子。所以他的誤上賊船，我們本「哀矜勿喜」的心情應予惋惜。

共產黨稱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他與高爾基生前都被共產黨利用，死後也都被捧為偶像，做為統戰的工具，這是完全相同的，但魯迅在共產黨赤化中國大陸前已經死亡，且在死前數年已識破共黨的真面目而逐漸覺醒。高爾基則在蘇聯所謂革命成功後，纔發覺共產主義制度的欺騙與

魯迅的智慧較之高爾基尚高出一籌，他的早死也較高爾基為幸運。

因周令飛的投奔中華民國，使魯迅成為熱門話題。但我們對魯迅的褒貶，與周令飛無關，魯迅歸魯迅，周令飛歸周令飛，孫子並不是活在祖父影子裏的人。

周令飛自有他的勇敢、智慧、才華與事業，我相信由於他明智的抉擇，必然給他帶來輝煌燦爛，幸福光榮的前途。魯迅九泉有知，也一定會為他有這一位孫子為榮。周令飛因他明智勇敢的抉擇，已經遠超過他的祖父了。

罪惡而予以抨擊，結果被史太林秘密毒死後予以國葬，又捧為偶像，利用他再來迷惑世人。所以魯迅的智慧較之高爾基尚高出一籌，他的早死也較高爾基為幸運。